

文史大觀



王安石

周恩來促成第二次
國共合作的談判斗争
育克在江西「王」王「王」王
三王王王王王王
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

一九九六年第四期(总 10 期)



一九九六年第四期(总第16期)

顾 问: 吴永乐 戴执中
江国镇 厉志成
总 编 辑: 周璆书
副 总 编 辑: 甘炳文 罗炎卿
陈文华 桂水金
万德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安群 朱宗奎
杜伊力 李国强
李天侨 杜德凤
吴吉如 吴志清
俞向党 俞兆鹏
袁 牧 夏逢南
彭适凡 熊桂花
李天侨
执行编委: 罗炎卿 李天侨
杜德凤
编辑部主任: 曾 粮
副主任: 喻民昆
助理调研员: 胡群红
刊 名 题 字: 康 庄
责任编辑: 涂 苏 中
美 术 编 辑: 李庆明
编 务: 张克勇 雷心刚
黄 茜 易芳霖
蒋文澜

协理与协办单位

(按协理姓氏笔划为序)

万里扬 江西桑海企业集团
王贤才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
王 翔 九江民生实业有限公司
李天侨 江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余修炎 江西共青垦殖场
张先仁 江西赣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胡飭海 赣新电视有限公司
熊桂花 江西京西工贸公司
欧阳效芳 江西赣南金达有色金属矿产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东乡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主办单位: 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
委员会

编辑出版: 《文史大观》编辑部

地 址: 南昌市叠山路 289 号

电 话: 6801814 6803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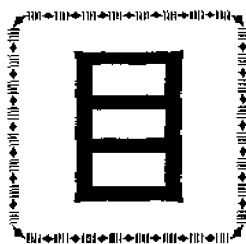
邮 编: 330008

照排印刷: 中共南昌市委印刷厂

江西省报刊准印证: 刊字第 01—059 号

定价: ¥3.60 元

7057/50



1996 年第 4 期(总第十期)

峥嵘岁月

- 4 周恩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斗争 尹超海
- 10 陈毅市长仁义救友 尹敬达(口述) 尹忠华(整理)
- 15 贺敏学在大革命洪流中 尹纬斌
- 19 江西苏区文化述略 陈新民

领袖风范

- 23 周恩来总理与话剧《八一风暴》 刘 云

将星陨落

- 25 三访甘祖昌将军 高 田
- 29 杜文达将军回乡探亲记事 杜才生

白发回首

- 31 在江西“五七”干校 萧 克

海外星云

- 40 爱国爱乡的港胞邓国容先生 孙独生

人物剪影

- 43 报界奇才黄远生 李传梓
- 48 严重将军两度隐居庐山 殷荫元
- 50 郭沫若一字题校牌 王国彬
- 50 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纪丽波

山川形胜

- 55 王安石纪念馆 何 江
- 30 我乘京九回家乡 胡源民
- 58 岳飞点将台在新干 朱剑卿
- 56 探庐山卧龙潭记 李庆明

抗日烽火

- 58 参加上海南京抗日回忆 钟同礼（口述） 杨晓苍（整理）
- 60 抗战时期的南浔师管区 刘书琴

企业之星

- 62 阵痛中升起希望
- 来自宁都县粮食系统的报告 李国生

周恩来促成第二次

●尹超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就在这国家危亡之际，蒋介石却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围剿”红军，屠杀革命群众。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战略方针，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浴血抗战局面的形成。周恩来在“逼蒋抗日”的斗争中，以非凡的胆略，卓越的才智，两上庐山，导演出波澜壮阔、文韬武略的光辉史剧，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当时的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把抗日与反蒋相提并论。

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亲自领导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首先选择了东北军张学良部作为统战工作的突破口，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周恩来在1936年4月9日，由李克农、刘鼎陪同，赴肤施（今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与张学良、王以哲举行诚恳的会谈。周恩来开诚布公地说：“中共中央原来的策略路线是抗日反蒋，在今天的形势下愿

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一主张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

周恩来说：“逼蒋抗日是有道理的，抗日如争取不到蒋介石集团参加是一大损失。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我愿将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同时，双方商定，各尽其责，为国分忧。张学良在国民党内部劝蒋；共产党在外部逼蒋，这样内外一劝逼，是有可能把蒋介石争取过来的。

4月22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诚恳的向张学良表示“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如约派刘鼎赴张学良处协助工作。这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四个月后放弃了“反蒋抗日”策略路线，实现正式作出“逼蒋抗日”决策的重大转折。

1935年11月，蒋介石要同中共建立联系，周恩来领导上海中共代表张子华、北方中共代表周小舟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等幕前幕后人物，提出国共双方应联合抗日的主张，敦劝蒋介石改弦更张，放弃“剿共”的立场，重新考虑第二次国共合作大计。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率先阐明中共中央应放弃以前“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在确保对苏区、红军的领导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苏

国共合作的谈判斗争

区、红军的名称。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所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一段话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寇大举侵华的形势面前，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全部或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周恩来首倡“逼蒋抗日”的政策路线，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产生巨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制定“逼蒋抗日”这一路线后，周恩来还以个人名义或与毛泽东等领导人联名致函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汤恩伯等人，重申共产党的诚意。“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并指出蒋介石如徘徊歧路，“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以肺腑之言劝诫蒋介石认清大局和形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受党中央之命和应张学良之请，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这为后来在庐山两次举行国共合作谈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

西安事变以后，事态发展有了新的变

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借张学良陪同经洛阳回南京之机，将张学良软禁起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谈判代表，督促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和放张学良回西安，积极斡旋奔走，先后同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举行过多次会谈，进行多方面的工作。

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恩将仇报，敦促蒋实现完成和平、统一撤兵、释放张学良的诺言。

周恩来于2月11日和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举行了国共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

3月下旬，周恩来先后在西安同张冲、顾祝同、贺衷寒进行多次会谈。周恩来坚持原则，要求蒋曾所提出甲、乙两案，应以甲案为基础，即东北军调甘肃，第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各县。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在红军改编的人数上和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上，处处设置障碍，力图缩小红军人数编制，将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拖延进攻红军西路军问题的解决。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周恩来建议率先实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争取在全国进一步的公开和扩大影响，造成国民党企图重新“剿共”的重重困难。

在二、三个月内虽然发生了一些重要变

化，如国民党取消了对中共的经济封锁，红军与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双方悄悄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国共两党的旗子交叉挂在一起。但在西安会谈的收获不很大，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西安进行的国共谈判问题需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解决。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要求，飞抵上海。周恩来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美龄，请她转交给蒋介石。

周恩来坦诚地对宋美龄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为了抗日御侮，在目前的形势下，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地位，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宋美龄感激地说：“周先生是大令的救命恩人，要不是周先生在西安多方做工作，大令不知落到什么下场？应该感激周先生。依我看，中共可以合法存在。”

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军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争取国民党内部更多的人士，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力量。

嗣后，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抵杭州，在西湖烟霞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重申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专横起来：“恩来，刚才你所谈的，我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但中共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拥护我为领袖，具体问题好解决。如陕甘宁行政区可

以是整个的，由你们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你们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决不派人破坏你们中共的部队。归结到一点，你们中共要提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蒋的谈话核心问题是自己要当领袖。

周恩来立即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故意避重就轻地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要中共先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

（三）

庐山独峙长江边，峰峦迤丽，景色迷人。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由张冲陪同，从南京抵达九江，到庐山西北山麓莲花洞。周恩来虽是第一次上庐山，但他无心浏览秀丽景色，而是集中精力，继续团结、争取身旁的中统特务头目之一的张冲，一道与蒋介石会谈，将其携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起草、由自己亲自修改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递交蒋介石，力陈我党的抗日主张。

要登山了，张冲以东道主的身份，请周恩来喝了云雾茶，然后要周恩来乘轿上山。

周恩来贴近张冲耳边，含蓄幽默地说：“7年前，如果没有钱壮飞，我这个伍豪就要变成你淮南先生的阶下囚了。如今，不但没有死，反被你请上山见蒋委员长，真是不打不成交，有幸有幸。不过，我是不会坐轿的，我们的身份不同，我是红军官员，不能坐在老百姓的肩上。你是国民党的官员，暂时还可以享受一下。”张冲又劝周恩来上轿，周恩来仍然婉言谢绝，空手徒步跟着轿夫一起攀登庐山。

停下来休息时，周恩来和张冲远隔轿夫和警卫人员，与张谈心：“淮南先生最崇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能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精神可贵。希望先生这次庐山会谈继续举力相助。”

张冲听后说：“团结抗日，共产党的主张深得民心。自受命以来，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周恩来步行了 18 华里山路，从莲花洞途经竹林窠、踏水河、好汉坡、月弓堑、半山亭，和张冲 抵达牯岭长冲。

庐山曾一度号称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夏都。从 20 年代末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曾 20 余次上庐山处理公务和避暑消夏。夏都的中心——“美庐”别墅，既是蒋介石官邸，又是国共合作谈判的地点。

6 月 8 日至 15 日，周恩来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冲进行了多次会谈。周恩来先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内容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蒋介石设置许多新的障碍，提出了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具体办法是：“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我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我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

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对其他各党不必谈合作。”企图从组织上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



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
下榻庐山仙岩饭店。

周恩来听了有些气愤，为了以理服人，还是平静地反问：“本来，是蒋委员长在杭州提出要先商量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现在，我们拿出纲领来，却为何撇开不谈？”

蒋介石还是坚持己见：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后，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 3 个师，4 万 5 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德、毛泽东两人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边区政府可由你们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由你们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

员；由你们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周恩来对蒋介石出尔反尔态度早有思想准备，严正地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委员长所提出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红军指挥机关、边区人事安排的意见，这些本来在杭州会谈中达成了一致意见，现在委员长要推翻，事关重大，我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关于朱德、毛泽东‘出洋’，这是我们党内部的

事，委员长无权干涉！”

周恩来又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人会谈，再次强调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请宋氏兄妹和张冲与蒋介石具体磋商。但蒋介石坚持改编后设政训处，周恩来声明回延安后再进行讨论。

周恩来斡旋于西安、杭州、庐山三地谈判。由于蒋介石惧怕中共和红军的发展壮大，没有诚意，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未释放张学良，但通过周恩来的外交努力，和苏联当时已采取联合蒋介石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国共合作的形势已趋于明朗化，蒋介石不得不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不敢杀害张学良。

(四)

周恩来于6月18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庐山第一次谈判的情况。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准备作出重大让步，提出一个新方案，原则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先要确定同盟会及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政治纲领；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权；7月中旬发表宣言，如蒋不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于8月1日后自行改编，共四万五千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七月内自行实行，向蒋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其中择一人任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

周恩来将新方案于6月22日电告蒋介石。蒋惧怕中共单独采取行动，便于6月26日电邀周恩来重上庐山继续谈判。周恩来在7月初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草案）》，准备再赴庐山同蒋谈判。

7月13日，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三人从上海抵达庐山，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表现出十分冷淡，他接过《宣言》说：“我先看看，还要动手改几句。”此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已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各方人士下榻美国学校。开会没有共产党的份，不让周恩来等三人公开露面，让三人下榻仙岩饭店。

蒋介石接到《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立即电召在南京的康泽来庐山，研究宣言草案。后来，康泽在蒋介石面前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仔细看过了。这个宣言的前面三点，我认为是可以的，后面说的一大套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应该删去，以免以后的麻烦，简短一些，只说明为什么要共赴国难就够了。”蒋表示同意，以后康泽就按照自己的意见修改宣言稿。

7月14日，周恩来单独会见张冲，表示：中共中央愿在蒋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张冲转告说：“蒋委员长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指挥权。”

7月15日，周恩来致函，由张冲转交蒋介石，函中指出：“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此与来（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山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及时电告中共中央，7月17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三人：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

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周恩来收到来电后，并不灰心，在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的直接会谈中，将中共中央这一让步的内容和诚意转告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看得特别重要，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他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行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而这次却改口，仍然顽固坚持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指挥权。

博古听了，怒发冲冠，有些沉不住气了，差点拍起桌子来。

周恩来比较冷静，仍然耐心地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快发动全国对日军的抗战。

7月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归纳成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应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周恩来把这十二条写成文，通过宋美龄递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由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周恩来当即请宋美龄转告对蒋介石的严正拒绝：“对宋女士在中间所做的传达、递

交工作，我本人表示感谢和理解，但对蒋委员长关于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对这一僵局，宋美龄脸上露出难以言状的微笑，与周恩来握手告别。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随即离开庐山，奔赴上海，断然决定蒋介石不让步不再同蒋谈判。

据康泽后来透露，蒋介石当时对边区辖境多划、少划几个县没多大关系，但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张继、宋子文、于右任择一担任不放心，提出要丁惟汾担任；蒋对中共中央提出朱德任政治处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也不赞同，提出要周恩来任主任，康泽为副主任，并指示康泽保荐李秉中为军政治部主任，刘伯龙、龚建勋、梁固荣为师参谋长，后又推荐乔树人为军指挥部联络参谋。因遭到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坚决抵制，蒋介石的人事安排均未实现。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举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而下地得到解决。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9月中旬，蒋介石要康泽通知博古到南京城内孔祥熙公馆相见，由康泽和博古代表国共双方就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签字。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和由周恩来提出的逼蒋抗日的重大策略已经实现。

周恩来的卓越才华，超群的智慧，无畏的胆略，为逼蒋抗日立下了汗马功劳，将功垂千秋。

（作者系江西省庐山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

陈毅市长

仁义救友

尹敬达(口述) 尹忠华(整理)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1952年5月上旬，江西省永新县公安局把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肖纯锦从上海押回永新县准备公审杀头。陈毅闻讯把肖纯锦救出去了。

肖纯锦，公元1893年6月18日（农历端午节）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西乡南汶村，早年留美，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系无党派高级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他十二岁离开永新县，再没有回过家乡。

陈毅为什么要从枪口下救肖纯锦，他们是怎样结识的呢？这要从头谈起。

上海 结为莫逆之交

18岁的四川青年陈毅，于1919年8月14日，飘洋过海，在上海与同伴们一

起，登上法国“麦浪号”货船，于10月10日抵达法国马赛港。年底，进入法国首都巴黎近郊的蒙达尔尼工学院求学。

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结识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蔡和森、何长工、赵世炎、徐特立、王若飞、聂荣臻、向警予等同志，组织了勤工俭学生自己的核心组织工学互助组。互助组以实行社会革命目的为宗旨，从事社会主义的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救中国，走俄国工人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努力钻研马列主义，积极参加法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爱国斗争。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勾结法帝国主义政府，以“赤党”、“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

强加在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头上，被法国政府于1921年10月13日晚11时宣布驱逐出境。

陈毅等104位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军队押解“监护”下，被迫离开法国。

11月23日回到上海，陈毅住在一个小客栈里。

当天夜晚，陈毅代表“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学生团”，写出了他们在法国的遭遇，向上海、国内外各界同胞呼吁，并连夜去敲开上海各家报馆的大门，投送报馆，请社会舆论支持。

11月24日，《民国日报》全文刊登了陈毅的《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通启》，同时《民国日报》还发表了陈毅等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04人到达上海

的消息，为他们向社会各界呼吁：“……惟此后如何度日？更何以求学？则此身无长物、举目无亲之青年，不得不重赖沪上各界热心维护矣。”

11月25日，上海《新闻报》等报也先后刊登类似消息以及调查报告、文告、通讯等文章。

这时，江西省永新县籍29岁的肖纯锦教授，正在上海东南大学执教，对陈毅等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深表同情和支持。肖纯锦到小客栈里看望慰问陈毅，并邀请陈毅到他家住处作客长谈。肖纯锦认定陈毅年轻有为、才华过人，与陈毅结为莫逆之交。并向陈毅表示，愿意尽力扶持他在上海入大学深造。

但是，陈毅婉言辞谢了肖纯锦对他个人的盛情厚意，决心回故乡四川为勤工俭学生的权益请愿，去奔走呼号。

肖纯锦特设家常便饭，为陈毅饯行，并赠送给陈毅一百元银圆作盘费。

1921年12月12日，陈毅乘轮船离开上海返四川。肖纯锦送陈毅上船，依依惜别。

陈毅尊敬地向肖纯锦行鞠躬礼后说，请先生保重，后会有期。

北平 增添师生情谊

1922年秋初，肖纯锦离沪赴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

这年，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在陈毅和全国各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的请愿斗争和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推出原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持人李石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筹办一所中法大学，收容被迫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肖纯锦当即致函陈毅，催促迎请陈毅来北京求学深造。直至1923年10月，四川军阀刘湘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救中国”、进行“赤化”活动罪名，用武装把陈毅“礼送”出四川省。陈毅来到北京，进入了中法大学文学系攻读。

那时，中法大学没有专职教师，讲课都是请北京大学的教师。李大钊、肖纯锦等教授常到中法大学讲课。这又增添了陈毅与肖纯锦的师生情谊。

中法大学没有校舍，陈毅和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好友蔡和森、肖振声、颜昌颐等一起住在西山碧云寺的破庙里，自己动手轮流办伙食，生活很清苦。肖纯锦常邀请陈毅到他家里长叙，陈毅成了肖纯锦家里的一位常客。肖纯锦在学习

上、生活上非常关心陈毅。

1925年冬，24岁的陈毅在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期满，以优异成绩毕业。肖纯锦劝陈毅不要离开北京，就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执教，研究学问。陈毅对肖纯锦说，先生的诚挚心意我领了，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一切要听从组织安排；当今之世，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愿先生与我共勉共行。

不久，陈毅奉命返回四川开展党的工作。肖纯锦深明大义，遂欣然设家宴，专邀请同事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赴宴，为陈毅饯行。

赣州 同赴国难肝胆相照

1933年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慕肖纯锦盛名，特聘请肖纯锦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长征，北上抗日。陈毅等奉命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日救亡高潮到来。

1937年8月22日，陈毅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和红军代表，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指派的首席代表肖纯锦谈判。

陈毅、肖纯锦两位老友久别重逢，表面上各自装作从不认识，不露声色，但却肝胆相照。肖纯锦立意成全中共代表陈毅，双方达成了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等协定。

这时，蒋介石从南京密电熊式辉：一定要抓紧时机，全力以赴，严密分县分山清剿，消灭南方各省共产党游击队，特别是江西共产党游击队。

熊式辉在电话里报告蒋介石，说：“肖纯锦为江西省政府首席代表与共产党红军代表陈毅接洽抗日合作谈判事宜，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蒋介石听了，气得暴跳如雷，责骂肖纯锦在签字前，没有请示他，滥用权力。

安福 夫人报信救战友

1937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达成全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0月，陈毅走出赣南油山，下山联络江西边境的红军游击队。

1937年11月上旬的一天傍晚，熊式辉接到国民党招募专员陈洪时（原中共湘赣省委书记，1935年投敌）

送来的：“陈毅在安福县武功山庵上召集谭余保，定于11月19日召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小队长以上干部将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会议”的绝密情报。熊立即通知召集尚在省府停留没有回家的省政府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派军队围剿安福县武功山，捉杀陈毅。江西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李中襄参加了会议。时肖纯锦已下班回家，也没有另行派人通知他去开会。

肖纯锦与李中襄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且有亲戚情谊，交往甚密。平日里上下班，两个人多般是同出同归，互关互照。这天，已过子夜了，李中襄才回家，肖纯锦还在灯光下看书。他对李中襄说，亲家，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呀？李中襄说：“熊主席突然通知召集没有回家的省府委员到他的办公室里开会，研究调兵围剿安福武功山，捉杀共匪头子陈毅。会议开了个半夜，还没有开完，明天还得要继续开。明天，你亦得去开会。”

天下事就有这么巧。肖纯锦返回屋里，轻轻地推醒正在酣睡的妻子程孝福，告知熊主席要捉杀陈毅事。

肖纯锦与程孝福忧心如

焚，商量对策。决定让夫人亲自去安福见陈毅。

程孝福，1916年留日女大学生，南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她一早化妆从省城南昌搭乘汽车，奔赴安福县。至严田，不识路径，沿途问津，徒步寻上武功山。爬上武功山的山路，就被两个红军游击队队员捉住了，押到了武功山寺庵里，站在谭余保主席的面前。

程孝福定了定神，望了望头发长得很长、穿着补丁打补丁棉布便衫便裤、腰上插着一根短竹把生烟斗、脚穿草鞋、像个地地道道老农夫的谭余保，问道：“请问你就是谭主席吗？我要见陈毅。”

程孝福的话音刚落，陈毅即从庵里屋出来了。

“肖师母！”陈毅惊奇地喊道。……

陈毅立即下令部队秘密离开武功山，转移到永新县铁镜山，再转移到九陇山。

11月19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调令江西省保安团和安福县及安福邻近的各县团队，严密封锁围剿武功山，结果扑了个空。

泰和 陈毅秘访肖纯锦

1938年春，熊式辉任命肖纯锦兼任江西省督导粮食增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直接

负责督导增产粮食、支援供给抗日前线军粮工作。为了解决好新四军部队军粮问题，1941年3月初的一天，陈毅扮妆成中学教员，秘密谒访肖纯锦。两位老朋友久别相见，有话直说。陈毅将新四军重整，部队粮饷俱缺、处境危困实情一一告之于肖纯锦，请肖纯锦帮助解决好新四军部队粮食供应。肖纯锦肩负江西省督导粮食增产、保障供给前线抗日军粮之责，他不顾反共高潮淹没身家性命的险恶处境，满足了陈毅所要求供给的新四军抗日军粮。当日，陈毅宿于肖纯锦家。次日凌晨，肖纯锦亲自护送陈毅出泰和县城，一直送到安全地带有人来接护陈毅。

送陈毅走后，肖纯锦利用他的职权，源源不断地供给新四军部队所需粮食。

这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有人以抗日战争期间秘密供给陈毅新四军军粮一事，指责肖纯锦“反蒋拥共”。

解放战争时期，南昌市的国立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等大专院校学生们在中共南昌地下党领导组织下，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野蛮镇压，打伤五十多个学生，逮捕十多个学生。

肖纯锦以他的中正大学教授身份、师生关系情谊，去医院、监狱探望、慰问学生。这样一来，肖纯锦更遭受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指控、排挤。1948年春间，他毅然辞掉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职务，离江西到上海诚明文学院、大同大学任教授。

上海 仁义教友传佳话

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有人约肖纯锦乘机离沪，飞往美国纽约定居。肖纯锦说，我不离开养育自己长大的祖国。肖纯锦与友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相约，一起住在上海，迎接解放。

再说肖纯锦的家乡永新县，解放前，地方封建势力各霸一方，派别斗争由来已久，其中以肖、周两派势力为最。肖、周两派，都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分别控制着永新县内大部分乡镇，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永新县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

肖派，又名永新县参议会派。肖派头目肖宗谋（肖稼轩），是国民党永新县参议长，肖纯锦的侄儿。他仗着肖纯锦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的牌子，在永新县拉帮结派，组成肖派政治势

力，残害老百姓。周派，又名永新县党部派。周派头目周志寅（周庭椿），是国民党永新县保警队副大队长，是国民党蒋介石嫡系军长周士冕（国民党东北剿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侄儿、周志道（国民党新编100军军长）的堂兄。他打着周士冕、周志道的牌子，在永新县组成周派反动团伙。

永新县解放初期，虽然经过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但是，永新县的地方封建势力，特别是肖、周两派派别斗争残余影响仍未肃清。因此，有人不作调查研究，违犯党的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仍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肖派总后台”两顶反动分子帽子戴在肖纯锦头上，把肖纯锦教授从上海捉回永新县家乡来公审准备杀掉。

1953年3月，陈毅市长亲自主持召开上海市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各界知名民主人士、社会各界名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深入讲解党的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广泛征求社会各界贤达名流意见，建设好人民的新上海。陈毅在会前，先看了到会人员，没有见到肖纯锦教授。陈毅

开言询问：“江西的肖纯锦先生来了没有？”

会场无人回话。

陈毅见此又问：“肖纯锦先生为什么没有来？”

会后，肖纯锦的同乡、好友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安福县人）、王造时（中国七君子之一，安福县人）教授，特到肖纯锦家，告知肖纯锦妻程孝福，说陈毅市长在会上寻问肖先生，并嘱语肖妻，不妨去拜访陈市长，救肖先生。

程孝福当即去上海市人民政府，见陈毅市长，直告：肖先生被永新县来人捉回去了，说是要杀掉他。她焦急地对陈毅说，请陈市长解救我家肖先生，请你赶快救救我家先生的命！

陈毅听了，深深感到救人如救火，立即拿起电话筒，给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打了电话，要求立即释救肖纯锦；接着又写了一个特急航递要求释救肖纯锦的专函给陈正人书记。其内容大意是：“陈正人同志：你省肖纯锦是个知识分子，正直高傲，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党做了一定有益工作。肖纯锦被他的家乡永新县捉去了。我意见：可将功补过。肖纯锦杀了没有？没有杀，请立即释放，并赔

礼道歉，护送回上海。”

陈正人接到陈毅要求释放肖纯锦的电话、信函后，立即电告、并将信函转交给中共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马健。

马健接到电话并信函后，立即到永新县公安局看守所，向肖纯锦赔礼道歉，接肖纯锦出狱，并设宴压惊。

马健很歉意地对肖纯锦说：“肖先生，你为中国人民革命做了不少好事，为什么一直不说呢？”

肖纯锦听了，坦然一笑说：“我说了，如果陈毅忘了，或记不起来了，或不认账，那不要说我肖纯锦是一个政治骗子吗？那不是要罪上加罪吗？我为中国革命做了一点点好事，是我为人处世应尽的天职，我不望图报。如果我望图报，那我也就不为人民做好事，那又何必必要自己说自己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做了好事呢！”

不久，中共永新县党组织派专人护送肖纯锦回上海。

肖纯锦一到上海，陈毅亲自接迎慰问，设宴把盏款待肖纯锦夫妇，为肖纯锦接风洗尘。

两位朋友久别重逢，心情舒畅，畅所欲言。陈毅问

肖纯锦在家乡永新的一段时间里有何感受。肖纯锦坦率相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算共产党毛主席英明、伟大、政策好；得天时、行地利、甚得人心。我肖纯锦打心眼里拥护、佩服。不过，我家乡永新县公安局在审讯人犯时，有些像过去苏维埃时期打AB团搞逼、供、信‘左’的做法。这点，我认为很不好，要立即改掉。”

陈毅听了，点头赞同。旋即指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按照党的政策，结合肖纯锦的德、才、资望，安排肖纯锦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并推荐肖纯锦为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

此后，每逢过年过节，陈毅多亲临肖纯锦家走访慰问。如果自己实在不能抽身去，陈毅就专委派他的秘书代为拜望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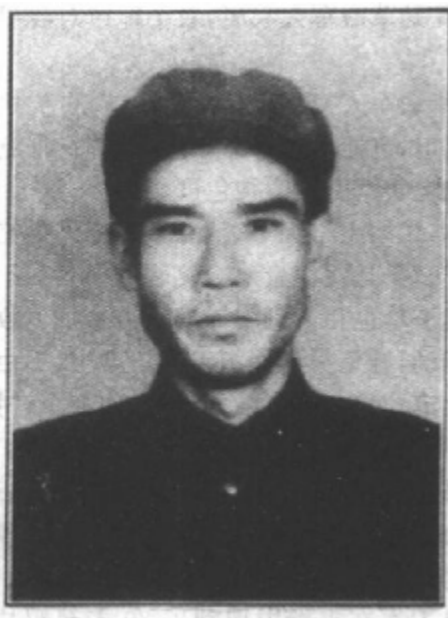
事后，陈毅将释救、安置肖纯锦事详细报告毛泽东主席。主席同意照陈毅意见办理，并说，肖纯锦援救了我们陈毅、新四军，就是放十个肖纯锦也应该。

陈毅这次解救肖纯锦，来不及事前请示主席，事后才报告主席，并向主席作自我批评。毛主席却说：“陈毅仁义救友，应该，应该。”

贺敏学

在大革命洪流中

● 尹伟斌



巍巍五百里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贺敏学，毛泽东称他为“上井冈山第一”的老红军战士，戎马一生，战功卓著。解放后，他曾任福建省副省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1926年，他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今仍在故乡流传……

勇闯“祥云斋”

1926年9月的一天凌晨，北伐军攻克永新，一青年带领队伍冲进了县衙门。衙门后院的团防局的兵丁吓破了胆，一枪也不敢放，乖乖地缴了枪。这位青年就是贺敏学，他时年23岁，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曾就读永新县禾川中学，与袁文才是同窗好友。他学过篾匠，后又拜名师学武，练得一身好武艺。贺敏学刚直豪爽，好打抱不平。投身革命后，是共青团永新县支部副书记。为了保护工农利益，严防土豪劣绅、反动派破坏革命，永新党组织和县农协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贺敏学任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大革命前，永新县豪绅和官商勾结大量贩进鸦片烟，开设烟馆，不大的县城竟有十多处烟馆，对群众危害甚深。取缔烟馆，收缴烟

土成了农民自卫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天，农军一个小分队来到县城最大的烟馆“祥云斋”收缴烟土，遭到老板吴廷弼对抗。他令众多打手把门，致使农军不能进去。吴廷弼是永新一个大财主，家有良田数百亩，加上在城内开烟馆的收入，可谓日进斗金，财源茂盛。吴老板为何敢与查烟禁毒的农民自卫军对抗？原来他有个弟弟在北伐军里任团长，有此靠山，他不把县农会放在眼里。贺敏学听到自卫队执行任务受阻的报告，不禁怒火满腔，亲自率领农军向“祥云斋”奔来。走到“祥云斋”大门口，几个打手果然持械拦阻，贺敏学大步走进，两手顺势同时来了个燕子掠水，这一招式，几个打手却觉着力有千斤，趑趄趑趄，直往后倒。贺敏学步入厅堂，吴老板故作镇定，打起笑脸，问：“贺总指挥亲临敝舍，有何贵干呀？”

贺敏学威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奉县农协会之命收缴烟土、烟具，望吴老板能给予合作！”

“敝馆烟土、烟具也是钱财购置，岂能一缴了之？”

“烟土乃害人之物，收缴焚毁，并不为过，

实乃有益桑梓百姓之举。”

“我乃革命军人家属，农会理应对我另当别论。”

“革命军人家属更要率先垂范，带头执行农会规定，岂能依仗革命家属之名，行抵制革命运动之实？”贺敏学神色严峻。

“本馆烟土早完了，贺总指挥今天是空走一遭了。”吴廷弼横蛮地冷笑着说。

贺子珍也和哥哥贺敏学一道参加了收缴烟土行动，她见吴廷弼拒不交出烟土，不由得怒火上窜，对身后自卫军队员大声命令：“搜！我就不信这个邪！”

吴廷弼示意打手拦阻，贺敏学历声喝道：“别动！”打手们知道他武艺高强，刚才又领教过他的厉害，踟蹰不敢上前。

自卫军在夹墙内搜到了20多箱鸦片和几十副烟具。贺敏学令堆放在大门口，亲自点火焚烧。烈火熊熊，吸引了上千群众围观，人们拍手称快。在贺敏学的指挥下，几天时间县城及四乡的烟馆全被取缔，烟土、烟具全被焚毁。贺总指挥的名字声震永新。

夜袭“武士队”

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永新的地主土豪组织反动武装反抗工农运动，杀害农会干部。

曾辉光是北乡大地主，其祖父曾任清道台，家财万贯，拥有田地、山林数千亩，然为富不仁，鱼肉乡民，而且是个淫棍，北乡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工农运动在永新兴起时，他组织私家武装“武士队”，公开对抗农会。“武士队”有20多人枪。乡农会要他实行二五减租，他一口回绝，并悍然下令“武士队”向乡农会干部开枪，乡农会主席中弹身亡。消息传来，全县震惊。党组织负责人欧阳洛和农协会委员长刘真当即指令贺敏学率县农军自卫大队摧毁曾辉光的“武士队”。

贺敏学已探知，曾辉光和“武士队”驻扎在几座高大房院内，四周高墙上有枪眼，墙内

有墩，“武士队”员可站在墩上居高临下射击。此房院易守难攻。如白天强攻，势必会造成大的伤亡。贺敏学决定夜袭“武士队”。

夜深了，贺敏学率自卫军悄悄来到曾辉光房院墙外。叫队员们架起人梯，贺敏学登上墙头，借着月光，看清了下面是草地，他便纵身一跳，落地无声。贺敏学环视院内一眼，大门旁边的小屋门半掩着，亮着一盏灯光。他猫着腰摸到门口，只见屋里两个兵丁一个正在打盹，一个睡眼惺忪。贺敏学扔出一块小石头引蛇出洞。那个尚未瞌睡的兵丁听到门外一声响，拿着枪，迈出门槛，贺敏学饿虎擒羊般从后面扑上去，右手朝他脑门一击，此人便如韭菜被热水烫了般软蔫蔫倒了地。接着，贺敏学一个箭步冲进屋里，那打盹的兵丁刚睁开眼，只见一把雪亮的匕首在眼前，全身不禁象筛糠般打起抖来。

“我是县农军贺敏学，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那兵丁一听是大名鼎鼎的贺敏学，顿时连声哀求：“贺总指挥饶命，我想活，我家上有老下有小……”



贺敏学及夫人李立英与外甥女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在一起。